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

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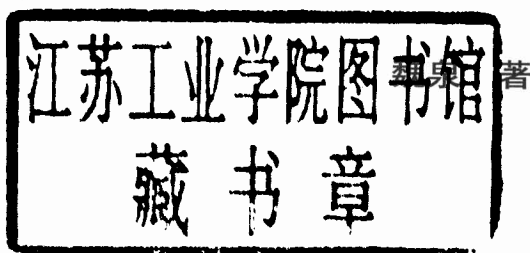
魏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

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魏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14124-3

I. 士… II. 魏… III. 知识分子-研究-宣武区-19世纪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836 号

书 名: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

著作责任者:魏 泉 著

责任编辑:艾 英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124-3/G·242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8.75 印张 335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 289 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

“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序

夏晓虹

在现在的户籍登记中，已将籍贯与出生地分离，所以，我也名正言顺地成了道地的北京人。除去“文革”中的插队七年，我的日常生活一直与北京息息相关。如此长久的人生经验，并不意味着我对北京的都市文化享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时，狭隘的个人阅历反而会一叶障目，使“熟视”变成“无睹”，并不明了表象下面的深厚意蕴。

以清朝时候的宣南、今日的宣武区而言，直到1968年离京插队以前，我对那里记忆最深的只是春节期间的厂甸庙会；其次要属前门大栅栏里的各式店铺，以及一段时间前往广安门中医医院治疗近视眼，乘车时不断经过的骡马市大街、牛街、菜市口之类的街名与站名。所谓“顾名思义”，我从这些街道名称中，想当然地构建出一幅老北京的市民聚居地图景，作为出身于机关大院的子女，我天然地对此充满排斥。而且，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市民”与“市侩”的意涵大致相等，我们口中说出的“小市民”，已经是相当严重的骂人话。所以，虽然很多次路过珠市口西大街到广内大街一线，却从无下车走走的愿望与兴趣。

插队归来，开始喜欢上了著名的古旧书店街——琉璃厂，但还是把它看

做宣武区的特殊地段,以为该区所有的文化质素都集中于这块地方。对于除此之外的市井街巷,我仍然带着早先留下的偏见,不屑一顾。说来尤觉惭愧的是,城南的名胜景区陶然亭,竟然也直到2002年春天,与学生们(包括本书作者)一起踏青时,方才到彼一游。因此,同在一城的宣南,与我四十多年的北京生活史居然很少交集,其似“近”实“远”,应该熟悉却相当陌生。

而现实生活中有意无意隔离的宣南,却时时出现在我所研究的晚清文献里。清代曾经实行满汉分居的内外城政策,这使得宣南逐渐成为汉族士人最为集中的区域。我专门讨论过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纾、秋瑾等,都曾客居、出入此间。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公车上书”、“戊戌六君子”死义,更是以这里为舞台实景展开的一幕幕壮剧。我很清楚,自己终究还是必须与宣南近距离接触。只是,要从书面文献与历史地图中,走进真实存在的一条条星罗棋布的大街小巷,细细搜访前人的点滴遗迹,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这对于现在的我,已经是颇为奢侈的愿望。

我因此非常赞赏魏泉把纸上的文字与地面的遗址对照阅读的研究方式。那些在北京胡同的寻寻觅觅,虽然不一定直接落实于论述的细节或结论,却并非论文写作过程中可有可无的余兴节目。在我看来,这些行走与体味,实在是其论文接上地气因而获得灵感与生命的关键。特别是由于魏泉所采取的研究思路,乃是以19世纪京城文人的聚会酬唱为中心线索展开,因此,雅集的地点,无论是公共场所的陶然亭、顾祠,还是私人住宅苏斋、小秀野草堂,便都以其特殊的文化传统蕴涵,赋予每一空间的文人交游不同的背景与意义。

这种浸淫其中的思考与写作,甚至在魏泉的文字上也有所显示。本书的主体部分乃是基于其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不过,借助去年8月起在哈佛—燕京学社研修一年的机会,魏泉又利用那里的资料,补写了《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作为本书的第三章。此章在整体结构上仍然延续了先前的撰述模式,与第七章既有呼应,又有区分:对后者所追溯的道咸年间“宋诗派”的前史作了补充考论,也以重在创作风气的传行有别于偏重“学人之诗”论说的探源。只是在我的感觉中,新作的一章与早先完成的部分相比,语气节奏已有改变。原来那种从容大度,至此已多

了一份内在的紧张。而这一趋势在最后的“总论”的文字风格上表现尤为明显,语句之间更不乏峻急。作者文风的变化应该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却更愿意联想到其最初撰稿时身在其中的北京文化的濡染。当然,此一评析并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意味;若从思考的深入与理论的提升着眼,现在的“总论”显然已大大超越其博士论文简单的“结语”。

关于本书的学术评价,我在当年填写的导师评语中已有总结。现摘抄其中主要的部分,以免重构:

此前的北京史研究,多以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分而治之”;而已有的文学史论著,也没有对作为元、明、清三朝帝都的北京“另眼看待”。由此,着眼于19世纪北京宣南地区的士林交游对于其时文化风气的影响,便成为魏泉同学博士论文的特出之处。也即是说,其选题力求将城市史与社会史、学术史、文学史诸种研究视角融会贯通,以突破原有的学科分割所造成的限制。这种研究视阈的扩大,使其即使面对前人多有论述的课题时,也仍能因为别具眼光而获得新解。如文中钩沉出的梅曾亮的京师交游在桐城古文流行全国中所起的作用,即为以前的论者所忽略。

在确定了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思路后,魏泉同学又采取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论述策略。其所选取的“宣南诗社”、“江亭雅集”、“顾祠修禊”与“小秀野草堂”四个个案,在19世纪宣南的士人交游中颇富代表性。论文从考证核心人物的诗酒唱和发端,愈转愈深,最终的关注点分别落在士风、文风、学风与诗风的变迁上。这种具体论说中的小题大做,是建立在大量爬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因而细密扎实,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如将“顾祠修禊”与道咸年间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相系联,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论题。

尚可补充的一点是,在域外学术成果的译介日见频密的今日,青年学者受到深刻影响原很自然、普遍。魏泉当然也不例外,海外汉学在其论文中留下的印记同样清晰可辨。而我更为欣赏的是她对套用这些现成理论所保持

的警惕。还在写作之初,魏泉已经明确意识到,诸如“公共空间”、“文学场”这类已然在中国学界大为流行的学术话语,乃是从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提炼而来,简单移用到其所研究的19世纪北京的区域文化,未必适合贴切。作者用力之处在于是转向从中国自身的理论脉络中寻找论文的支撑框架与核心概念,正如其自陈“研究视角的形成”时所言:“传统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系统,其丰富的历史涵盖力和富于弹性的阐释空间,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开掘。”有此自觉,“诗可以群”于是被她从悠久的“诗教”传统中抽绎出来,并以其中所包孕的文学的交际功能,解读19世纪京华文人的诗酒之会,而此一历史时段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之间的关联因此得到了恰当的揭示与呈现。

显然,所有研究角度的选择都有所取也有所舍,在照亮了某些部分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一些东西。魏泉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其著作并无“包打天下”的意愿。而她以独到的视角照亮的那些人与事,已足够引人兴味,并先已让我这个北京出身的学者获益良多。

2008年8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1

序/夏晓虹/1

第一章 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1

一、“宣南”的由来和定义/1

二、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3

三、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9

四、人文资源的负载和积淀/13

第二章 文人交游的传统与空间/16

一、“诗可以群”的儒家诗教传统/16

二、“诗为友朋而为者居多”：唱和的作用和酬唱诗的价值/18

三、诗社和雅集/21

四、大风气与小圈子/26

五、19 世纪的京师文人交游/28

六、研究视角的形成以及问题的选择/30

第三章 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34

一、“苏斋”的来历与“为东坡寿”的发起/34

二、“苏斋弟子”的赓续和发扬/51

三、“为东坡寿”与清中叶以后的宗宋诗风/65

第四章 “宣南诗社”再研究

——嘉道之际的士风与汉族“行省官僚”集团/71

一、关于“宣南诗社”的争论/71

二、“宣南诗社”的由来及其活动情况/74

三、有关“宣南诗社”的几点辨析/83

四、“宣南诗社”与嘉道之际的汉族“行省官僚”集团/93

五、“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101

第五章 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108

一、梅曾亮入都之初京师的文人集团/109

二、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的形成/119

三、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125

四、梅曾亮出都以后/139

五、“城南风景”与“日下胜游”/145

第六章 “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148

一、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顾炎武/148

二、“顾祠修禊”的缘起/151

三、倡建顾祠者的学术活动和师友交游/156

四、中后期的“顾祠修禊”/169

五、“道咸以降之学新”的两个重要标志/175

第七章 “小秀野草堂”与陈衍的“学人之诗”说/177

一、“小秀野草堂”的由来/179

二、“元诗大有因缘在”/185

三、“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187

四、陈衍对道咸年间“宋诗派”的追溯/192

五、“学人之诗”说的形成/198

第八章 总论:“出入于文史,见之于行事”

——兼及对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205

- 一、几点感受/206
- 二、寻求真相:社会学的转向与后现代理论的挑战/209
- 三、出入于文史:折衷传统与现代/212
- 四、见之于行事:一个尝试/216

附 录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218

附 表 一、“顾祠修禊”题名表/237

二、徐黄召集江亭雅集表/255

三、翁方纲主持“为东坡寿”列表/259

附 图 一、明清北京城示意图/265

二、清代宣南地图/266

参考文献/267

与北京结缘(代后记)/280

第一章

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

“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

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人文资源的负载和积淀

一、“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说,所谓“宣南”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宣武门以南的地区。明朝开国后,将元代大都城改名北平,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缩减北部,拓展南部,建起明北京城的新北墙和新南墙。明中叶以后,又计划在內城四周修建外城垣,但因财力不足,只修建了环抱南郊的外城墙。外城的修筑,使此后的明清两代北京城在平面上呈现出特有的凸字型轮廓(参

见附图一)。^①自明中叶北京外城建成以后,就已经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宣武门以南”,且有了名为“宣南坊”的行政区划。但是“宣南”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意蕴的名称,却是在清代逐渐形成的。

1644年,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沿用明朝的北京城,在城市建筑的规划上没有大的变动。但在京师居住政策上,清政府施行满汉分治。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政府下移城令,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和“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②汉人可以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而旗人则分配内城原明代遗留宅院居住,并可领取俸禄,不事生产。这一政策,使得清代京师行政区划分为“满城”(内城,或曰北城)和“汉城”(外城,或曰南城)。这就使得不同的城区,在地理方位的意义之外,又增添了种族之别含义。这种区别是清代所特有的,其影响也很深广。^③满汉分城而居,带来了城市结构的重大变化。原来位于内城的一些重要商品集散地如庙市、灯市、书市等在移城令下不得不纷纷外迁^④,经过许多年的自然演化,重新形成了清代北京城特有的城市格局。在如此巨大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有种种原因导致宣武门以外成为当时大多数汉族士宦择居的首选。

首先是明代内城曹司之设,卿、寺、台、省诸郎曹都在宣武门。当时宣武门内的一些胡同,多为官员住宅。所以,“入都之税驾,与出都之饯别,莫便于宣武门外”^⑤。而明代也已有官员在宣武门外修建了一些宅邸或别墅。外地士子进京赶考,中原及南方诸省之人的进京路线多由卢沟桥进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因此,明代宣武门外也已建有一些各省会馆。当

① 关于北京城建置的变迁,可参看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 《清实录》,顺治五年八月。

③ 这种满汉分治的政策在顺、康、雍、乾、嘉、道之际都是被比较严格地执行的,道光中叶以后才渐见松弛。

④ 明代最繁华的棋盘街“朝前市”清代已不复昔日之盛,书肆、灯市等移到正阳门外,城隍庙市移至广安门内慈仁寺。参见高松凡撰写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七章“城市商业与市场分布”。

⑤ 《广州会馆记》(明天启四年,1624),《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365页。

清政府移城令下达后,汉官在外城买宅或择地建房,选择宣武门外多少可算是顺理成章之事。如夏仁虎《旧京琐记》所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①汉官加上外省在京的士子聚居于宣武门外,久之便为“宣南”这一地理名词增添了一层独特的人文风貌。提到“宣南”,就会自然联想到“汉族”、“士大夫”这样的人文含义。因此,“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也就代表着“宣南”这一地理概念中人文意义的凸显。随着清代京师经济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加,“宣南”作为汉族士大夫的集中聚居区愈趋密集,而其独有的人文环境和特色也就日渐成型并趋于突出。最终,“宣南”这一名词所负载的人文意蕴,遂远远超出了当初单纯的地理含义。这种人文地理意义上的“宣南”^②,是清代所独有的,也是本文在进入对宣南的相关讨论之前,对所采用的这一名词术语的一个基本界定。

二、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

清代宣南成为在京汉族仕宦的聚居地,其初始因素固然与清政府的“满汉分治”政策有关,但此后历经百年而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士人社区,则与宣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发展过程有关。

首先是明代显宦遗留下来的故宅别业,为在外城觅居的汉官提供了现成的住宅。围绕这些显赫的宅邸,在周围的胡同中,自然形成一些士大夫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比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在琉璃厂以南所建的孙

①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城厢》,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版。形成“东富西贵”的最主要原因是崇文门为京城总税卡,故多商人停居。而中原与南方各省人员进京,都要经过涿州,向北过卢沟桥,进广安门,因此停居于宣南是最方便的选择。在进京人口中,总的来说,士子人数要远远多于商人。这也是后来渐渐有了“宣南”之称却没有“崇南”之说的主要原因。

② 按照吴建雍先生对宣南的有关研究,所谓“宣南士乡”所包括的范围是:一、琉璃厂附近街区(西起宣武门外大街,东至琉璃厂、梁家园;北起护城河河沿,南至骡马市大街);二、宣外西部(北起上斜街,南抵广宁门大街;西起下斜街,东达宣外大街);三、以半截胡同为中心的小区(北起广宁门大街的东段、骡马市大街西段,南至横街;西起轿子胡同,东至下洼子)。《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46—250页。

公园,就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风景优美。在其南部,还有明人故园梁家园,至康熙时湖山景致仍在。这一带后来演变成士人居处特别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的例子还有康熙年间大学士王熙在明代权相严嵩别业基础上所建的怡园^①,和康熙年间户部给事中赵吉士的寄园^②。这些私家园林到乾隆年间多已败落或易主,如怡园至乾隆时已被王熙子孙“割裂售人”^③,但也因此容纳了更多的居住者。

其次,士子会馆的逐渐增多是构成宣南人文氛围的又一重要因素。“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皆建会馆以资憩息。”^④明代北京已有了专为应礼部试的各地举子提供食宿的士子会馆。清代满汉分城而居,各省会馆因此多建于外城,而以宣南最为密集。会馆的建设有一个过程,清代会馆发展最快的是乾隆、嘉庆年间。乾隆年间曾任工部郎中的汪启淑在其《水曹清暇录》中记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致外城房屋基地价值腾贵。”^⑤会馆迅速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各省州府郡县在京争相设馆,有的一省多馆,甚至有的县也不止一处会馆;另一方面,宣南的街巷胡同中则愈来愈密布着各地所建的会馆,少则三五所,多则一二十所。^⑥士子会馆之建,本为各省举子入都应试时居留之便。而清代科举考试,会试由礼部在京主持,每三年一次。政府会按例为各省赴京考试的举

① 据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记载,怡园的位置在今米市胡同、菜市口胡同、北半截胡同、烂漫胡同一带,北至骡马市大街,南抵南横街,是当时有名的私家花园。

② 赵吉士所居寄园在教子胡同。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记:“赵恒夫所居寄园,濬池累石,分布亭馆,种花木。海内名士人都,恒流连不忍去。”也是康熙年间宣南极富盛名的园林名胜。

③ “其在米市胡同者,已归云坡胡少寇季堂,开池重建,水亭杰阁,颇称幽雅。”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90页。

④ 嘉庆二年《新置字县程行六字号公局碑》,转引自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页。

⑤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第156页。

⑥ 据汤锦程所著《北京的会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31—32页记载,一些会馆密集的道路如宣外大街,会馆达22所,珠市口大街有17所,粉房琉璃街也有17所等等;一些宣南著名的胡同如米市胡同有会馆12所,贾家胡同有会馆11所,烂漫胡同有7所,北半截胡同8所,菜市口胡同8所等等。

子提供一定的单程车马费,也就是俗谓“公车”。每科会试录取的人数在三百名左右,而每科应试人数却多达六七千人。每三年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汇聚于宣南,可以想象除了应试之外,这里还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相互交往的机会。另外,除了食宿之外,也还会有跟读书人有关的其他需求。夏仁虎《旧京琐记》云:

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曰引见官员,一曰考试举子。然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试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故其时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莫不坑谷皆满,而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之求馈遗之品者,值考举之年,莫不利市三倍。迨科举既废,市面遂呈萧索之象,于朝于市,其消息固相通也。^①

与科考及读书人相关的另一重要场所是书肆。明代北京的书市主要集中在内城,即现在的前门内、东城的灯市口、西城的城隍庙街等处。清代实行满汉分城而居,且内城不准开设店铺,商民都迁徙到外城。所以清初内城的书市也都移到外城,原来的城隍庙书市即移到了慈仁寺。康熙年间是慈仁寺书市最盛之时,后人笔记记载“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②,如宋荦诗句“华灯九陌挂春风,独买残编古寺中”,即指慈仁寺书市。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有关王士禛买书的轶事^③。

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宣南地区破坏严重,慈仁寺书市也就此一蹶不振。此前,琉璃厂地区已经有了“百戏杂陈,锣鼓震天,游人纷集”^④的

①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75页。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孔尚任《燕台杂兴》记王士禛事:“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称“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称:“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书摊候之,已而果然。”

④ 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3页。